

# 财税史话

中国古代财税演进与  
国家财富分配

黄燕 著

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3000多年来传统中国财政的收支分配、管理制度以及财税思想。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上海学术·经济学出版中心

本书研究时间从中国的远古时期至清朝，通过探讨各个朝代维持国家发展的财政机制、财富分配制度、财政分配的制度逻辑，解答了各个朝代为什么选择相应的分配制度，动因是什么，以及这些政策如何一步步演进，又对近代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同时，本书还引入了最新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成果，探讨范围包含财税与财富分配两方面的内容，史料真实、内容丰富，逻辑清晰，语言平实易懂，可读性强。



微信公众号



天猫旗舰店

ISBN 978-7-5642-4282-4





9 787564 242824 >

定价：88.00 元

# 财税史话

中国古代财税演进与  
国家财富分配

黄燕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上海学术·经济学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税史话:中国古代财税演进与国家财富分配/黄燕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 11

ISBN 978-7-5642-4282-4/F. 4282

I. ①财… II. ①黄… III. ①财政-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②税收管理-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 IV. ①F812. 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12842 号

策划编辑 陈 强 朱晓凤

责任编辑 朱晓凤

封面设计 贺加贝

## 财税史话

中国古代财税演进与国家财富分配

黄 燕 著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mailto: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23 年 11 月第 1 版 202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710mm×1 000mm 1/16 18 印张(插页:2) 304 千字

定价:88.00 元

# 前言

财政是重要的国家财富分配工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极为丰富的财政实践经验。正如南宋时的学者叶适所言:“财用,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叶适集》卷4)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强调财政史的重要性时提出:“财政史是一个民族整体历史中最为基本的部分……财政史使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发展的推进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实在的条件(特别是组织的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sup>①</sup>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开篇部分指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中国财税的演进历史是经济类学生以及财税从业人员的必修内容,结合财政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笔者试图通过讨论中国财政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演变轨迹、特点,方便读者了解、掌握和运用中国财政演变发展的规律,为我国正在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本书在传统中国财政史的基础上,以断代史为时间轴,以国家财富分配制度的建立、发展、变革为核心,阐述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与国家财富分配制度,意图解决如下问题:维持中国长期发展的财政机制是什么?主导中国古代国家财富分配制度的产生、衰落及向近现代转型的思想基础是什么?中国古代对财富在政府与民间分配、中央与地方分配的财政逻辑是什么?中国社会发展的财政动因是什么?

---

<sup>①</sup> Joseph Schumpeter,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in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ited by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本书将国家财富分配思想引入中国财政史内容,从全新的角度解读3 000多年来国家财政的收支分配、管理制度及财税思想。笔者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传统史学,突破以往史学著述过多地从政治学角度解释财政问题的限制。同时,由于引入了最新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成果,努力做到史料真实、内容丰富,用考古成果的直观性和现实存在性使读者对历史的形象性理解由原来的抽象、晦涩,变为简单明了。

经济史教育本身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政治思想教育,又是专业教育。就前者来说,它是爱国主义教育,是振奋民族精神的教育。一个不了解祖国历史、不了解民族历史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精神寄托、没有崇高抱负的人。就后者来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唯物辩证法的教育。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是逻辑发展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时刻围绕爱国主义精神,将民族自信贯穿始终,从中国自身的逻辑出发进行研究,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变迁和逻辑过程来组织材料、提炼概念、构建理论,将当前中国的现实看成本民族机体自然成长的结果。本书期待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多民族整体如何从文明启蒙、国家建立、文化交融发展为当今世界上唯一延续的古文明,中国为什么能够在3 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绵绵不息,一次又一次如凤凰涅槃般在苦难中重生。

关于中国财税历史的内容散落在经史子集及其他浩瀚的文献之中,本书的史料以正史记载的经济、食货资料为主,引用亦尽量使用经典的古代文献版本,为了保持阅读的流畅,只在正文中标注文献出处,详细版本陈列于最后的参考文献。同时在编写过程中,笔者亦学习和参考了当下史学专家的历史、考古研究成果,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本书的写作及出版得到了山东工商学院的同事们大力的支持与帮助,上海财经出版社的编辑也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达我的感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在史料文献的选取、观点表述等方面势必存在诸多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目录

- 第一章 远古时期的社会生产与公共财富形成的萌芽/001**
  -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经济生活/003
  - 第二节 父系氏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分配/007
  - 第三节 私有制的出现与公共财富分配的形成/011
  
-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国家财富分配制度的建立/017**
  - 第一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时代背景/019
  - 第二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收入/026
  - 第三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支出/035
  - 第四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管理及国家财富分配制度的建立/040
  
-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税变革与国家财富分配思想/045**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时代背景/047
  -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与财政变革/050
  -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055
  -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管理及国家财富分配思想/061
  
-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财政与中央集权分配制度/067**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与中央集权分配制度的建立/069
  -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财政收入/073
  -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财政支出/084
  - 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财政管理机构与制度/092
  
- 第五章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与分配制度的沿袭与融合/095**
  - 第一节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097
  - 第二节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收入/101
  - 第三节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支出/110
  - 第四节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管理及胡汉分配的沿袭/115

##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财政与国家财富分配/117**

-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时代背景/119
- 第二节 隋代的财政收支/123
- 第三节 唐代的财政收入/127
- 第四节 唐代的财政支出/135
-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财政管理及国家财富分配/139

## **第七章 五代至两宋时期的财政与国家财富分配/145**

-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财政/147
- 第二节 宋代的社会经济背景/154
- 第三节 宋代的田赋与徭役/156
- 第四节 宋代的工商税收/162
- 第五节 宋代的财政支出/169
- 第六节 宋代的财政管理及国家财富分配/174

## **第八章 辽、金、元时期的财政与国家财富分配制度的探索/181**

- 第一节 辽、金、元时期的政治经济/183
- 第二节 辽的财政收支/186
- 第三节 金的财政收支/188
- 第四节 元代的财政收支/193
- 第五节 辽、金、元时期的财政管理及国家财富分配制度的探索/207

## **第九章 明代财政与新经济模式的碰撞/211**

- 第一节 明代的社会经济时代背景/213
- 第二节 明代的财政收入/219
- 第三节 明代的财政支出/228
- 第四节 明代的财政管理与新经济模式的碰撞/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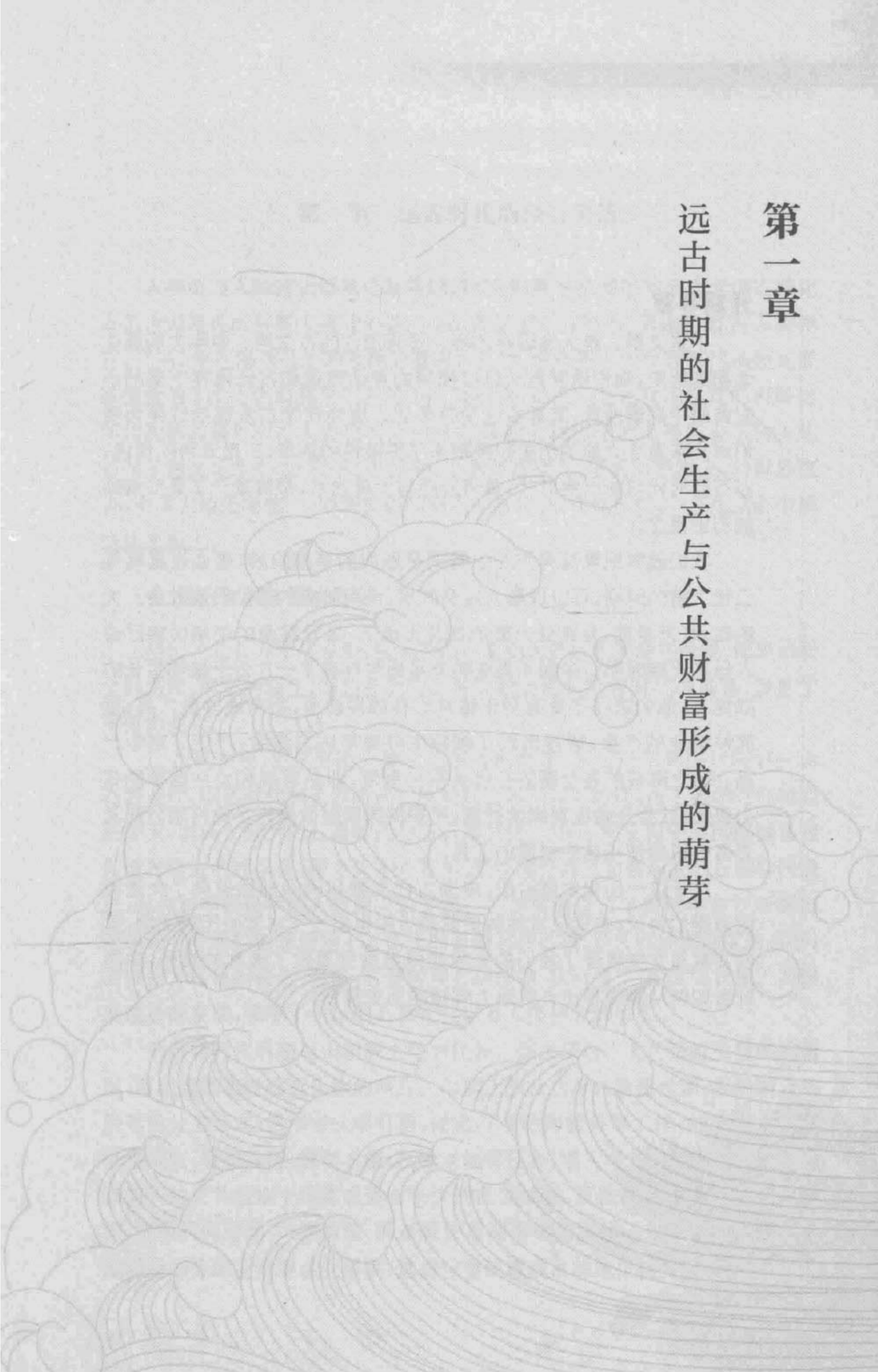
## **第十章 清代财政与国家财富分配/239**

- 第一节 清代的政治经济背景/241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财政收支/246
- 第三节 清代中后期的财政收支/259
- 第四节 清代的财政管理及国家财富分配/274

## **参考文献/278**

# 第一章

远古时期的社会生产与公共财富形成的萌芽



## 开篇导言

中华文明，是人类现存的唯一没有消亡的古文明。中华文明诞生之初的历史，我们通常是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古代保存下来的历史典籍中探索所得，其真实性尚存争议。现当代考古发掘的成果为我们对文字诞生之前的历史研究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三皇五帝的传说，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黄帝云师与大禹治水，都被赋予了更加清晰的历史概念。

我们通常把夏商周作为中国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那么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时期，可以理解为没有政府、没有阶级的原始氏族社会。大约在 10 万年前，在东亚大陆的这片土地上，多元起源的中华民族已进入母系氏族时期。中国人类先祖幸运地生存在了一片适于植物生长的陆地上，他们选择了更有利于维持生存的种植业，不断地改良工具，提高种植业的产量，慢慢出现了维持生存食用后的盈余，产生了剩余产品。随之形成的是全新的社会关系与制度，即私有制和公共选举的权力集团，社会开始出现剩余财富，早期的国家财政是为了更好地分配及更有效率地使用这些财富的工具。

对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古代文献和民间神话保存了大量美丽浪漫的传说；各地已发掘的史前遗址中也出土了丰富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献与文物展现了我们的先祖如何为后世奠定了国家的雏形，中国社会如何从蹒跚学步开始走上辉煌的历史舞台。

##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经济生活

人类由类人猿进化而来已是共识,1965年考古发掘出的云南元谋古猿化石是中国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之一,证明在170万年前,云南已有古人类生存。1964年在陕西公王岭发现的蓝田人头骨,将蓝田人的生存年代从原先普遍接受的115万年前提早到大约163万年前,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有确定年代数据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1954年开始发掘出土的山西襄汾丁村人化石及丁村文化距今20万~2.6万年,上承北京猿人,下启山顶洞人,向世界宣告:中华大地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祖先一脉相承、代代相传,一直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 一、远古传说与原始社会

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发展,从人类的产生到人类社会的萌芽阶段,即原始社会的出现、国家的诞生,原始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9世纪初期,史学家把人类文化演进的次序,按生产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原始社会属于石器时代,由于石器时代时间跨度大,因而又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1961年发现于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的西侯度,距今约180万年,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保存有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的证据。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出土的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其制作方法包括锤击、砸击,石器种类有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西侯度遗址的发现,提早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用火的历史。

旧石器时代后期以山顶洞文化为代表。据山顶洞人文化遗址所反映的情况,可以推测当时已有氏族的萌芽。早期氏族社会存在着按性别、年龄划分的简单的分工形式:男子多从事狩猎、捕鱼以及防御猛兽等工作;妇女则多从事采集果实、看护住所、缝制衣服、抚养老幼等任务;老人和儿童则辅助劳动。山顶洞人的公共墓地中埋葬着男女老少的氏族成员,反映出血缘亲族关系的密切,表明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集体已正式出现。他们在随葬品的分配上没有多大差别,这意味着氏族成员的地位较为平等。

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有不少远古人类生活的传说。如关于采集、渔猎的传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韩非子·五蠹》）

关于用火的起源：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起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食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庄子·益跖》）

这些远古传说乃至神话，似与现今考古所知者不谋而合，但我们今天仍要辩证地看待，分辨其中的虚构、夸张与实录。有巢、燧人、伏羲、神农、黄帝等传说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时期是战国，西汉司马迁综合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传说，写下了《五帝本纪》，将原本各自独立的原始氏族的古史传说置于同一个系统，以黄帝为共祖。这是在商周至汉初华夏民族逐渐统一的历史趋势下，将各氏族的祖先组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固定世系。

参照考古学成果及古代文献，可以认为，三皇和五帝是前后两个不同时代，其表现形式是人类使用的工具的材质不同。东汉袁康所著《越绝书》中引用战国时代风胡子的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斫伊厥，通龙门，决江导河”；“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从上可知，三皇是使用石器的时代，距今不少于5万年；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是使用玉器的时代，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为铜器时代，距今已有三四千年；春秋战国为铁器时代，距今已有二三千年来。

## 二、母系氏族公社与农业的选择

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农业起源，农牧业的分工，以及农牧业代替渔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随之出现了定居的村落，进而发展到制作陶器、饲养家畜，修建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畜牧业、磨制石器业、制陶业、纺织业，标志

着人类已进入生产经济阶段。在此以前,人类只是食物的采集者,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耕种土地、饲养禽畜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来源,间或还有剩余。这种生态环境促进了人口增长、生活稳定以及配套的社会制度的形成。

我国已发掘出了丰富的氏族公社的新石器文化遗迹:在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sup>①</sup>“马家窑文化”<sup>②</sup>,北部地区从东北部起,经内蒙古、宁夏直至新疆,分布着大量的“细石器文化”<sup>③</sup>,在其他地区,近年来也出土了各种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的新石器文化遗迹。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在半坡、北首岭等遗址发现的数百具骨架都属于蒙古人种,和近代蒙古各支人种比较,则与太平洋支的南亚人种系、远东蒙古人种系接近,体质特征接近近代南方人。仰韶文化地区附近的人是今天的中国人的血缘先祖,这是考古学上已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1977年和1978年在河南新郑发掘出土的裴李岗遗址<sup>④</sup>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裴李岗遗迹表明当时男女在生产上分工不同,男性以从事农耕和狩猎为主,女性以加工粮食为主。除了裴李岗遗址,其他各地已出土的文化遗迹也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古人们的主业。

### (一) 南北地区的农业选择

中国的农业,大约是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出现的。古人之所以选择农业,既有其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从中国地形、地貌看,北部为荒漠,西部和西南部为高原,东部和东南部是大海;境内有长江、黄河流贯东

① 仰韶文化,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为仰韶文化。其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

② 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故名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05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和凉州的谷水流域一带。历经了1000多年的发展,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4种类型。

③ 细石器文化以细小的打制石器为主要特征,其石器多以玛瑙、石等为原料。分布地区主要在东北、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广大地区,是我国北部和西北部广泛存在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④ 裴李岗遗迹的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死者多是单人葬,个别的为合葬。多数墓葬内在死者两侧放置了数量不等的随葬品。男性墓主多随葬石铲、石斧、石镰等生产工具和陶器,女性墓主则多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等。

西,大小河流遍布其间;气候温润,土地也比较肥沃,是适于农耕的环境。但以神农氏为代表的先祖之所以选择农业,应是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所致。史传: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义》)

古人选择农业作为主业的原因有三:(1)人口显著增多,活动区域相对扩大,需要有比较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2)人口众多,禽兽不足,生活资料来源不足;(3)传统的采集果木之实等食物来源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有一定危害。三者之中,食物不足应该是主要原因。因此,古人选择了适于定居、有选择和发展空间的农业作为主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首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得到了开发。在采集和狩猎经济形式下,受自然条件制约很大;受野生植物的再生能力和野禽、野兽的繁殖能力的影响很大,加之狩猎艰难,使人们终日忙于觅食。而农业的种植和栽培,则为人类提供了较为稳定和比较丰富的衣食之源。其次,随着农业种植业和栽培业的发展,收获的作物增多,为人类定居及之后发展稳定的社会制度奠定了物质条件。最后,农业种植业的发展,也为家庭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人们的饮食及其他副产品增加了新的来源。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出土物看,北方的遗址出土了狗、鸡、猪、羊等动物骸骨,南方的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水牛骨,说明此时的家庭养殖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原始农业就是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即先将原始的树木植被砍伐掉或放火焚烧,然后用石斧、石铲、木棒松土后进行耕种。这种耕作技术相当原始,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就处在这个阶段。在西安半坡等遗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谷物的皮壳,经鉴定是粟(小米,比较耐旱的农作物,适宜我国干燥性气候的黄土地带)。姜寨和半坡遗址都发现了饲养牲畜的圈栏遗址。<sup>①</sup>从仰韶文化各遗址所发现的诸种遗迹、遗物的数量比例上看,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而其他如采集、渔猎和家庭养殖,只不过作为副业而已。

1972到1974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由四个文化层组成,叠压关系非常清楚,每层遗物各有特色,前后互相关联,逐步发展。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层。

<sup>①</sup> 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新发现[J]. 文物,1975(08):82—86.

它的绝对年代距今约 6 700 年到 6 900 年。在遗址第四层十多个探方广达 400 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厚度从一二十厘米到三四十厘米,最厚处达七八十厘米。根据对部分完整谷粒外形的鉴定,认为属于栽培稻的籼稻稻谷。观察河姆渡出土的文物可知,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农具有骨制耒耜,家畜有猪、狗、水牛。将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比较后可知,无论是农作物、牲畜、用品等均有明显差别,很明显这是南北两个同期但类型相异的文化。

我国古代农业遗迹的出土,说明一万余年来,农业和农业生产逐渐成了氏族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衣食之源,也是氏族公共事务活动的物质来源。

## (二)手工业的产生

新石器时代一项新兴的手工业是制陶业,当时,制陶业主要是有经验的妇女的专属工作。制陶业是仰韶文化的最高成就,在西安半坡、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发现了一些专门用于制作陶器的土窑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较多,如炊具有鼎、甑、釜和陶灶等,陶灶可以随意搬动,使用方便;饮食器具有钵、碗、盆、盘、杯等;汲水的用具有小口尖底瓶;储藏食品或盛水的器具有瓮、罐等。浙江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和第四文化层出土了 10 多万片陶片,已复原的陶器有 200 多件。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的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以前,人类处理食物一般采用烧或烤的方法;有了陶器后,人类增加了煮熟食物的方法,并且便利了饮用水的运送和储存,使人类能够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可见陶器的制作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中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家庭纺织业也在编织业的基础上出现了,从西安半坡和陕西华县泉护村出土的麻布痕、江苏苏州草鞋山出土的葛布、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织机零件看,至少在距今六七千年前,我国就已有了织布机和纺织业。

手工业中除了制陶、纺织外,突出的还有加工复杂的生产工具。对石器的磨光和钻孔是人类的另一个重要创造,也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 第二节 父系氏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分配

距今大约四五千年以前,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

从母系氏族逐渐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地下考古材料,如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等,长江流域的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都体现了这种社会变革。这些原始文化是以各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地,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山东章丘的龙山镇、甘肃广河的齐家坪、江苏淮安的青莲岗、浙江余姚的良渚镇和湖北京山的屈家岭等地名命名的。

在母系氏族公社制度繁荣阶段,农业、畜牧业不断发展,促使当时的社会组织也不断变化。仰韶文化晚期半坡类型遗址的墓葬出现多人合葬的新现象。墓葬习俗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相一致的。比如在母系氏族公社前半期,生产资料和财产是氏族公有的。氏族作为当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既是一个血缘集团,又是一个经济集团。全氏族成员在生产时,共同劳动,共同占有产品,死后一同埋在公共墓地里。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民主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同自然做斗争的能力不断提高,过去需要整个氏族才能从事的生产活动,而今在较小的范围内就能够完成了。为了便于生产,氏族内部便依照血缘的亲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若干个小生产集团,这就是氏族内部划分成若干个母系家族的原因。母系家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占有财产。共产制家族经济下的对偶家庭成员,包括一些始终属于别的氏族的男子,他们死后必须归葬到自己出生氏族的墓地。这种家族的产生,意味着母系氏族制度开始走下坡路,并以缓慢的步伐向着父系氏族制度前进。

### 一、父系氏族公社制的形成

大约从5 000年前开始,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华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前期还是母系氏族占主要地位,到中、后期便开始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了。在西部地区,马家窑文化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到齐家文化就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在长江中、下游流域,马家浜文化可能还是母系氏族,至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大概已是父系氏族了。

长城以北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在技术上比中原地区的原始,有的遗址根本就没有发现陶片。那里的人们主要从事狩猎和游牧,可能较早进入以高级畜牧业为主的生活,而高级畜牧业往往是以男子劳动占主要地位的。因此,可以推测细石器文化地区可能较早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母系氏族社会之所以转向父系氏族社会,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男子在农业和畜牧业劳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从山东堡头、青海柳湾的墓葬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人们在劳动上有了明确的男耕女织的分工。男子在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成为主要劳动力,而妇女则成为从事纺织和家务等的次要劳动力。这与仰韶文化早期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男子从事作为辅助经济的狩猎形成鲜明的对比。男女生产劳动分工的变化,决定了男女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这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者既然已不是妇女,她们也就逐渐丧失了过去那种崇高的社会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男子变成了社会的主宰。

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按父系确定血统关系和继承权。男子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拥有更多的财产。随着对偶婚进一步发展,子女已确知谁是自己的生身父亲,迫切要求改变旧的继承法,由自己继承父亲的财产,父亲也愿意自己的子女继承自己的财产。为解决财产不能流出本氏族与父系继承这个矛盾,人们改变了原有的女子留在本氏族、男子出嫁的旧传统,变为让男子留在本氏族,女子出嫁到男方氏族,随男方居住,血统关系按父系计算。这种变化虽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却是在完全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这一变革,并不损害任何别的氏族成员,并且对待这种变革,父亲和儿女是欢迎的,妇女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子女,当然也是欢迎的。

在这一大变革过程中,原来夫妇关系不甚牢固的对偶婚,逐渐向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过渡,这是男女双方比较牢固和持久的结合,一般都是终身的夫妇关系,这就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细胞,因而也成为氏族制度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1974年在青海乐都柳湾发现一个规模很大的氏族公共墓地,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类型的墓葬。已发掘马厂类型合葬墓24座,其中有夫妻合葬墓,如319号、348号墓,一为老年夫妇,一为成年夫妻,这反映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和父权制的建立。<sup>①</sup>

## 二、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商品交换的产生

从各地出土的耘田器和石锄等物品看,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农业经济逐

<sup>①</sup> 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J]. 文物,1976(01):67—78.;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J]. 考古,1976(06):365—377,401—404。